

元祐元年(1086)四月初六,王安石与世长辞,享年六十六岁。身后没有人撰写墓志铭,墓前无神道碑。

同年,苏轼在《答张文潜县丞书》中表示:“文字之衰,未有如今日者也,其源实出于王氏。王氏之文,未必不善也,而患在于好使人同己。自孔子不能使人同,颜渊之仁,子路之勇,不能以相移,而王氏欲以其学同天下。”

在同时所作的《送人序》中,东坡又说:“王氏之学,正如脱槩,案其形模而出之,不待修饰而成器耳,求为桓璧彝器,其可乎?”

一场批判王安石新学的热潮,掀起了。

王氏新学是变法思想的哲学基础,自有其不可抹煞的历史价值。治平年间,安石在金陵讲学,一大批要求改革现状的年轻士子受业门下,俨然形成新学学派。与此同时,安石“一道德以同俗”的思想也逐渐成熟并固定化。到了神宗的熙宁时期,他更把这一思想跟科举改革结合起来,使之付诸实践。《三经新义》一变而为官方哲学,作为取士的标准答案,“诸生一切以王氏经为师”,“独行于世者六十年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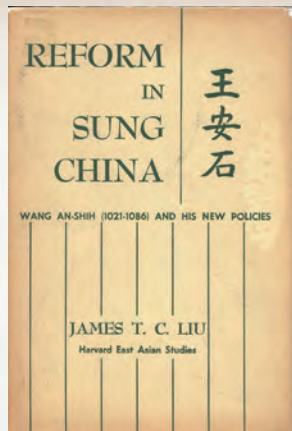
王安石追求思想一统的新的正宗地位,以适应政治改革的需要;却恰恰窒息了自欧阳修以来所开创的自由讨论的风气。崇尚自由的苏门,自然会因此而不满了。

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、中国宋代文学学会副会长朱刚表示,从中唐到北宋有一种文化思潮,称它为“新儒学”也好,“道学”也罢,总之是一种新的儒学形态,一方面希望指导士大夫的人生,一方面意欲成为国家的指导思想,对政治发挥作用,而“古文”是其表达方式。这种思潮所包蕴的理想,通过王安石变法全面地向现实转化,即从思想运动落实到政治改革。但随后,当王氏“新学”被定为“国是”,王氏“经义”被确立为统一的科举文体时,其对于士大夫思想自由和文学多样化的损害,也是不言而喻的。

流弊舛误,自可批判。

可怕的是清气渐散,迷雾丛生。“元祐更化”全盘否定王安石变法。宋哲宗亲政后,“绍圣绍述”又彻底清算元祐更化。其后直到宋徽宗晚年,变法措施大多重付实施,明眼人却一望即知,东京梦华之下,败坏的种子不受控制地萌芽生长。

海外宋史学家刘子健将这一恢复变法期称之为“后变法时期”,在其《中国转向内在》里有一总体性鸟瞰:后变法时期丧失了王安石的理想主义初衷,改革精神化为乌有,道德上毫无顾忌,贪赃枉法肆意公行,拒绝革除任何改革体制的弊端,对那些继续反对改革的保守派进行史无前例的残酷迫害,皇帝



美国华裔学者刘子健于1959年出版的英文著作“Reform in Sung China”(《宋代改革——王安石及其新法》),是海外王安石变法研究的权威著作。



叶坦著《大变法》是研究“王安石变法”的参考书之一,该书从经济学角度出发,认为神宗才是熙宁变法的真正主角。

好大喜功、奢侈无度,整个社会道德沦丧,所有这些都使得恢复变法时期聚集了一批声名狼藉之辈。

徽宗上台,经过一年多的折衷调停,建中靖国元年(1101)十一月,便宣布明年改元崇宁,表明其崇尚熙宁新政的国策取向。以崇宁元年(1102)七月蔡京任相为界限,其后虽仍高张变法的旗帜,但与熙宁新法已无多关系。诚如王夫之所说,王安石精心擘画而“名存而实亡者十之八九”。



蔡京虽奸,其弟蔡卞却政声卓著,还是王安石的女婿。神宗年间,“王荆公嫁女蔡氏,慈寿宫赐珠褥,直数十万”。

安石此女,是个厉害角色。周焯《清波杂志》卷三载:

蔡卞之妻王夫人,颇知书,能诗词。蔡每有国事,先谋之于床第,然后宣之于庙堂。时执政相语曰:吾辈每日奉行者,皆其咳唾之余也。蔡拜右相,家宴张乐,伶人扬言曰:右丞今日大拜,都是夫人裙带。

洪迈《夷坚志》丁集(卷四)记了另一个段子:蔡卞官至枢密院事,当孔庙释奠时,请求追封王安石为舒王,位居孟子之上,受天下儒生供奉。(不知这主意是否仍然是和夫人“先